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八九期 ——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2e)

【回顾反思】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史实辨析】	谢富治之女为母亲辩诬	
	——读刘小沁的信所引起的深层思考	佚名
【史林一页】	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顾反思】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 丁凯文 •

邱会作将军去世9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1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998页，约80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中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262）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式因为才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力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1、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1963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370）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965年6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377—379）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通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去看的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393—395）1966年3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

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 409—410）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 399）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师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 380）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2、“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谗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他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 549—566）：

（1）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2）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3）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4）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5）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6）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7）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8）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9）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10）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11）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页349）。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913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1）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2）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3）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565）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565—566）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1）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45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452—453）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454）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2）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1966年10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10月5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455）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1967年1月28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3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456）

（3）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459）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

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 593）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 508—509）

（4）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 527）

（5）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 1968 年 3 月 25 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 577）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师们的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 610）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从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有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6）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

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 593）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 594—596）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道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师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师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〇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 877）1967年5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〇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 878）三〇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〇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〇一的医疗造成的。”（页 879）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〇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〇一医院的报告，看了X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〇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 880—881）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〇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

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〇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〇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〇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敖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〇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璋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璋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璋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璋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璋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璋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〇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璋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

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1980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1、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1980年9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901）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492）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言。

2、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902）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师，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师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1971年8月8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师，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师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908）

3、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902）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

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908—909）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六、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509）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页69）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613）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支力量。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658）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

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7 2 0 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75%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愿向邱会作将军表达由衷的敬意，愿邱将军英灵永生。

~~~~~

【史实辨析】

谢富治之女为母亲辩诬  
——读刘小沁的信所引起的深层思考

· 佚 名 ·

近日，有史学界好友转来谢小沁（刘小沁）写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一封信，并附其母亲刘湘屏和她过去写的两篇材料。我读罢沉思，生出不少感慨，先从头说起吧。该信全文如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是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编辑。  
最近看了你社出版的《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其中周少华文中说我母亲不许其父住院，避风港、要政治局批、在批斗现场得不到救治等等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  
早在多年前我们在《作家文摘》报上第一次见到周少华的不实之辞时，我母亲就写过事实真像的有关说明，希冀按照历史原貌解除误会，还历史本来面目，还个人公道。  
原以为周少华本人在文革中犯过未经核实就把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敌伪资料上报江青的过错，有过如此经历的人更应接受不核实必出错的惨痛教训，更应知道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实事求是”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对刘湘屏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党的历史重大事件是否公正严谨真实的

重要问题。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重要意义。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如果仍像文革时期一样不负责任，惟命是从，将功诿过，人云亦云，甚至墙倒众人推，把莫须有的罪名硬扣到弱势者头上，显然经不起时间检验。历史总有还原真相的一天。

贵社是党史的重要出版单位，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

特转去刘湘屏和我过去写的两篇材料供研究。

此致

刘小沁 2008.12.27

谢小沁的父亲是开国上将谢富治。母亲刘湘屏，山西永济县人，1920年9月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与谢富治结婚。19岁任山西高平县县长，一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中多次负伤，在反“扫荡”战斗中被日寇芥子毒气严重烧伤，差一点牺牲在战场上。

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10届中央委员和卫生部部长的刘湘屏被隔离审查多年。今年88岁的刘湘屏老人豁达乐观，与世无争，十几年来一直资助几个病困下岗工人和贫困学生。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周少华回忆父亲周荣鑫的文章，早在五年前的2003年，刘湘屏就有话要说：

“关于抢救周荣鑫同志情况的说明”：

《作家文摘》上摘登了周荣鑫同志的女儿周少华的文章，文章中说1976年4月12日是不允许周荣鑫住院，我还表示周住院要经过政治局批准，因此耽误了对周荣鑫的抢救，致使周病逝。

周少华在文章中对我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责任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周荣鑫同志发病的事情直接向我反映、请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秘书杨洪年，一个是北京医院的院长林钧才。

那一天我在家里办公，准备参加当天的一个外事活动。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我接到电话，是杨洪年打来的，他说林院长找我。我问有什么事。杨说周荣鑫同志病了。我问什么病。杨说林院长说病得厉害。我说那就赶快抢救呀，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杨说林院长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去抢救了，但有些问题还要向我请示。我说好吧，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杨说林院长马上会给我打电话。

放下电话不久，林院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周荣鑫同志病得很厉害，我已经向卫生部报告了，他们向你反映了没有。我说已经通知我了，刚才我还给秘书说要赶快派人抢救啊。林院长报告说已经派人去现场抢救了，林院长还在电话上说了派去医生的姓名，都是医术比较好的医生。

我问是什么病，他说据派去的医生报告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周部长是在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上发病的，现在趴在桌子上，不能说话，血压很高，很危险。我说那你们赶快抢救啊，病危了还不赶快送到医院抢救？他说抢救没有问题，医生已在现场抢救了，但遇到一些阻力。林院长问我能不能找一找教育部，以便尽快把周荣鑫同志送到北京医院。我一听很着急，病危了就应该送医院嘛，找教育部干什么呢？

北京医院新大楼收治病人的标准，早就明确规定包括周荣鑫同志在内的各部部长。这个标准卫生部自己定不了，当时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制定的。这一文件的初稿是北京医院起草、卫生部和国务院值班室讨论，纪登奎同志审查后由我口头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小平同志同意后我又让林钧才正式行文，由我签字上报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了这一文件。具体由北京医院来执行。

这些情况不仅我知道，林钧才院长和北京医院都是清楚的。我说：政治局批准过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周荣鑫同志不仅符合标准，前一段有病就住在新北楼，你们还让我找谁呢？林钧才院长为难地说：部长啊，现在这种情况你也了解，周荣鑫同志是在教育部的会上病倒的，还是想办法给教育部说一说，不然我们不好办，我请示你就是这个意思。

当时正是运动初期，林院长只敢说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也不敢具体指明是什么人。我们只能心照不宣了。

我也不熟悉教育部的人，具体情况又不清楚，我怎么能找教育部呢？当时是纪登奎同志分管卫生口。原来分管我们卫生系统的是吴桂贤，她要走，就临时让纪管卫生口了。我和纪登奎很熟，我告诉林院长，我马上给纪登奎打电话。林院长一听，马上就说，希望快一点给纪打电话。

我把林钧才院长的电话放下后，马上就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电话是纪的秘书小杨接的。小杨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我说：小杨，我找纪登奎同志讲话。杨秘书说他休息还没有起来，晚上开会睡觉很晚。我说我有一件大事要报告登奎同志，周荣鑫同志病了，北京医院已派医生去教育部现场抢救了，比较严重，送院遇到困难，一时还没有转到医院。杨秘书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不在现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医院找我帮他们找教育部解决，我怎么找教育部，因为登奎同志现在管我们这儿。我只有找登奎同志，你赶快给他讲，帮助解决一下。小杨说等纪起来马上就给他报告。我说心脏病不能等，你尽快请登奎同志处理。

中午纪登奎同志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已经过问了，马上转医院抢救了。我当时对纪说：登奎同志，我马上有一个外事，现在走不开，你是不是能尽快到医院关照一下。纪登奎同志说：我下午就去看他。这就是纪登奎同志的回话。

这就是我处理抢救周荣鑫同志的经过，北京医院当时就派医生到现场抢救，我既没有说过不让周住院抢救，也没有说过须经政治局批准。相反，我是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时间就立即想办法帮助他住院的。

1976年到1981年，卫生部对我隔离审查。卫生部专案组说有人揭发你对周荣鑫同志不予抢救进行迫害。这件事情家属也有意见，要我老实交待。我向专案组说明这是对我毫无根据的诬陷，并提供了与此事有关的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秘书及纪登奎本人为证，让专案组找当事人调查核实，我可以当面对质。

我告诉专案组，在这件事上，我只和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的秘书，纪登奎四个人通过电话，专案组有必要找他们本人直接核对情况。他们可以证明我非但没有干扰抢救周荣鑫同志，而是立即报告纪登奎想办法尽快送他去医院。当时去教育部现场抢救周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证明，医生出诊应有记录，周荣鑫同志的病历也会有相应记载。专案组可以一一找这些当事人查证我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我对专案组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并不复杂，完全可以说清楚。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一共只有四位。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立即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请他过问帮助，北京医院和林钧才院长是很有压力的。我在抢救周荣鑫同志的问题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周荣鑫同志的事情。

专案组做为一级审查组织，不应该偏听偏信，而应该去找这些当事人调查取证。专案组和相关档案中是会留有查证这件事情经过的文字记录或相关材料。

1985年，经过对我长达9年的专案审查，卫生部给中央《关于刘湘屏问题的审查报告》对我做出政治结论。其中专门有一项所谓我“利用职权，刁难老干部住院治病”的罪状。但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周荣鑫同志。这说明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核实，强加于我的“见死不救”、“不让住院”、“要政治局批准”等等耽误周荣鑫同志抢救的罪名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

运动初期，有些人说话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都经历过党内运动，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该有切身感受，群众说过头话和做过头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我们党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也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群众议论捕风捉影，但党的审查和定案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定案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信口开河。如果人云亦云、无中

生有，肯定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党的报刊杂志不经核实就刊登不符合事实的文章，以讹传讹，损害的不光是我个人的名誉，也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公信力。

刘湘屏（签字） 2003年

然而，同样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谢小沁母亲的情况说明石沉大海，无人理会。

五年后的今天，《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继续重复周少华的一家之言，上海《新民晚报》等报章也刊登了周少华的文章。谢小沁再次投书党的出版社：“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

于是，目前对于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之死，我们至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能听到被掩盖五年的微弱声音，让人们自己去分析和判断，这无疑是我们社会开放改革进程中的一种进步。

再追溯到16年前的1992年，谢小沁曾给《人物》杂志一封信，这就是她提供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另一篇材料。

《人物》杂志：

你刊1992年第六期所登项南《该我开炮了》一文中所说：“谢富治的老婆……竟然动手打了谭老一个耳光。”纯系造谣！

1967年8月20日在人大大会堂的批谭大会有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等参加，与会群众近万。只要是正派的，实事求是，不见风使舵的好人，都能证明刘湘屏根本没有打过谭震林。知情者还应记得，当时刘本人也是被八机部造反派拉去陪斗的。

关于刘打谭的谣言是1978年《人民日报》纪希晨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到。在对刘湘屏长达三年多的隔离审查中，曾被做为罪状。刘湘屏当时即给党中央写信申述，要求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找当事人核查此事。经卫生部专案组深入查证，证明确系不实之词。故在给刘的政治结论中去掉了这一条莫须有的罪状。

贵刊可向卫生部专案组核实，也可以直接向当时在场的干部群众查证。当时与会的干部，群众近万人。我想他们看到项南的不实之词，只会对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发生疑问，《人物》杂志的真实性，可靠性也会受到损害。

“一损俱损”的人，要求“一荣俱荣”的项南登报更正致歉恐是“天方夜谭”。只寄希望《人物》不是势利眼，才贸然致函。

此致敬礼

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

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11.12

毫不奇怪，谢小沁的信自然无法摆脱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的命运。

然而，在同样一本《红星照耀的家庭》的书中，谭震林的子女并没有认可媒体和网络上流传多年的所谓“刘湘屏动手打谭老一个耳光”的说法，这是耐人寻味的。

谢小沁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说：

“谭震林伯伯及子女就很正派，虽然书报杂志上到处都编造我妈打他耳光，但谭震林本人及子女自己的文章中都没有这条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能够事实求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我母亲对谭老板非常尊重，谭伯伯对她也非常器重赏识。多少歪曲历史的谣言假革命之名，离间和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我母亲非常伤心。谭家子女在《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中坚持说真话，令人欣慰！我和老母由衷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读罢上述文字，笔者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中央铁定的林彪、江青“两案”所涉及到的犯有罪过或错误的人员，他们还有没有话语权？是否也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们是否也适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是不给阶下囚话语权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哪里容许你申辩？中共建国之后，只要是最高领袖钦定的“反革命”，也同样被剥夺申述的人权，文革冤狱遍于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戴上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党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吗？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死于非命，允许他们为自己申辩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余威眈眈，所以才有不少人的回忆录拿到境外出版，再“出口转内销”。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一组“改革八贤”的好文章，我景仰这八贤，但觉得明显少了一个第九贤，谁都知道，谁心里都有数，就是不能说，不准说。体制使然。

历史人物的研究从来就是复杂和困难的，多年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复杂和困难。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惯性，说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倒成了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在对待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长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例如把文革史的研究列为禁区，长期的愚民政策与中国人底层社会的流民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的臣民心理，皇上圣明，成王败寇，人云亦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墙倒众人推。这才有韶山冲里的香火鼎盛、顶礼膜拜，才有北大孔副教授之流的极左分子横行于学界，恣意强奸历史。国情使然。

但是，打入另册的人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就拿谢富治来说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伟大统帅把江山社稷交给了夫人，又提拔女儿当北京市委副书记，提拔侄儿当大军区政委，提拔表亲的孙女当外交部副部长。

当时身在高位、握有重权的谢富治呢？1969年，谢小沁从大学提前毕业，谢富治要女儿改姓，怕她沾父亲的光，谢小沁只好从母姓。谢富治把谢小沁送到兰州军区空军，从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练。谢小沁的弟弟则于1967年被谢富治送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一呆三年，死里逃生，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中国的上将之子出国作战，出生入死，惟此一人。

这些历史恐怕人们闻所未闻。站在历史高地上说句公道话，无论谢富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什么严重问题，在严格要求子女、不为子女谋私利这一点上，谢富治做得不赖。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当年对林彪的评价曾是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大混沌闹剧，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荒诞丑闻。当副统帅在位时，如日中天之际，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就变成了“林彪的扁担”，画家的新作令人眼花缭乱，长征路上的娄山关只有统帅和副统帅两个人；当副统帅葬身大漠，似乎他从孩童时就是个坏小子，军史中十大元帅变成了九大元帅了。我们相当多的党史学者，文学家、影视剧作家、画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邀功，或政治高压下而自保，人格扭曲，变成俯首摇尾，跟着风跑的犬儒，为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而搅尽脑汁，他们或许是很学有学问的聪明人，独独缺乏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

这种史学犬儒繁衍不息，今天也不少见。前些年《解放军文艺》有一篇写谢富治的文章，说他“六亲不认”，情节离奇，流传全国。谢家人找出版社交涉，这才知道此文通篇是谎言谣言，编辑登门向谢家道歉了事。

历史将永远记住萧克老将军。文革中，他不怕风险，明确指出，林彪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

者；然而，林彪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他又为林彪说好话，纠正中央批发的材料中对林彪的不实之辞。

萧克老将军是治史者的楷模。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他把“求实存真”四个字作为治史者的铁律。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萧克老将军把王充的话题赠《炎黄春秋》杂志，以资告诫和勉励。

这些年来，所谓“红色后代”时兴为自己的父兄写历史回忆录，这本是件好事。但这些书良莠不齐，里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学问可大了。父母是正面人物者，就加金贴银，例如毛家的少将媳妇回忆她母亲的那本书，就把本来在新疆监狱中表现不太好的老娘描写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他的博士儿子描写伯伯的那本书，硬说他大伯开着坦克，英雄无比，带兵直取柏林，这种子虚乌有的瞎编和疯话让有历史常识的人捧着下巴找牙医；再说上面提及的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罢，这位当年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小将，1967年向江青写信并送去30年代上海旧报里的“伍豪启事”，成为刺向周恩来心中一把利刃的始作俑者，她在回忆其父的大作里会如实坦白这件大事并说明当年父亲是认可她的“革命行动”吗？

当然也有好的，周秉德回忆伯伯周恩来，罗东进回忆父亲罗荣桓，罗点点回忆父亲及其他党史方面的著作，都写得真实而令人信服。去年陈毅的儿子陈丹淮曾公开辟谣，他针对不少书籍里关于文革初期陈毅大骂林彪且预见到林彪会背叛毛主席的描写，笑道：“没有这回事！当时父亲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

父母是反面人物者，则揽功诿过，百般辩解，希冀为不堪回首的历史粉饰于万一。

所以，人们在看“红色后代”们所写的书的时候，切莫全盘接受，要独立思考，多问问懂历史的老人。

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红色后代”们，好好学习萧克老将军，在写你的父辈时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杜撰史实，可以悄悄掺点“三聚氰胺”别人却不知道。历史不属于你的私人财产，你不尊重历史，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笑柄。升平世界，朗朗乾坤，知道历史真相的人多着哪，小心说假话让人家抓住尾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心定气爽，只有忠于史实，才能走近真理。

我们正期待着中共党史出版社能给谢小沁一个满意的答复。

~~~~~

【史林一页】

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

• 杨银禄 •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亲自给林彪拍摄了一张手捧《毛泽东选集》的免冠照片，起名叫《孜孜不倦》，并发表在197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署名“峻岭”。此前一天，即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

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不指名地批判张春桥。吴法宪等人别有用心地提议学习和讨论林彪的讲话。与会者群情激奋，纷纷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者是野心家，特别是华北组尤为激烈。8月25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报告分组讨论的情况，哭诉：“要揪人了！”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简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全会随后开始揭发和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受到了批评。9月6日，全会闭幕，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会上除了继续批判陈伯达，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被迫写的检讨，并传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多次批评。4月29日，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意见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很显然，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江青更清楚，这一切都是针对林彪的。在这种背景下，江青还亲自为林彪照相，对林彪公开进行吹捧，使许多了解内幕的知情者大为不解。

就在这张照片发表一个多月后的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越过中国国界，进入蒙古国上空。凌晨2时30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汗，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在异国他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人们对江青为林彪拍摄的那幅《孜孜不倦》的照片颇有微词。此事到现在过去近39年了，仍有不少议论和说法。

有人说，毛泽东于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在南方巡视期间，想推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多次指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地，或者三个四个地，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江青给林彪拍摄这幅照片并刊登在两本画报上，是毛泽东有意吩咐江青做的，其目的是为了安抚林彪，暗示毛泽东还没有抛弃他，希望他改正错误，做个检讨了事。

还有人说，那次林彪主动到钓鱼台，是想请江青搭桥求见毛泽东，谈谈话，做个检讨，以请毛泽东原谅他，并没有照相的思想准备，所以连胡子都没有刮就去了。

江青爱好摄影和照相，并有一定的技术。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她精气神儿特足，大小会议都积极参加，显得十分活跃。会前会后，邀请了不少高层领导人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17号楼照相，然后放大成16寸的彩照送给他们，以显示她的摄影技术。从那时起，她照相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有人说：“那个时候她照相都照疯了！”

1971年6月8日下午，叶群带着她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窃取的鸡血石等宝物到钓鱼台10号楼给江青看。江青则拿出她拍摄的得意之作请叶群欣赏。当叶群大捧江青的摄影水平之后，江青对叶群说：“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明天如果林副主席身体好、精神好，请林副主席到我这里来，我想给林副主席也照一张相。”叶群听了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先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林彪同志知道江青同志要给他照相以后，一定会很高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我一定动员林彪同志来这里照相。”江青高兴地说：“那好，我热情欢迎林副主席来这里照相。”

6月9日下午，林彪、叶群践约来到了江青住地钓鱼台10号楼。

我看到林彪和叶群兴致勃勃地来到10号楼的楼厅，急忙到江青的办公室报告。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快步走到楼厅。林彪从沙发上站起来，同江青握手，互相问候。江青说：“欢迎林副主席来我这里。看到林副主席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叶群说：“今天林彪同志来这里，是请江青同志照相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你们两位一见面这样高兴，我也很高兴。”是的，林彪来钓鱼台的目的的确是专门让江青为他照相的，如果他想请江青搭桥求见毛泽东，他们会到办公室或客厅去谈话，不会在楼厅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谈话。况且，林彪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之事，是头一天已经约好的。江青为林彪照相，不是毛泽东授意的。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就是那个时候江青也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她曾多次叫我给毛主席的秘书高碧岑打电话说想见主席，却一等再等，一直没有回音。8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到了湖北武昌，江青还不知道呢，仍然叫我打电话询问什么时间能去见主席。毛主席的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打值班室的电话，值班员才告诉我主席已经到外地去了。江青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这个东兴同志，主席这样大的行动也不告诉我一声，在他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这个人啊！”

对一般人来说，既然要照相，起码要准备一下，刮刮胡子什么的。林彪到钓鱼台专门让江青照相，连胡子都没有刮，确实让人不好理解。但如果了解林彪这个人，又不难理解。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与江青一样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还多了一怕，即怕水。平时，他很少洗澡、洗脸，也不刮胡子，不修边幅。而林彪不刮胡子到钓鱼台来看江青，也不是第一次了。1969年4月，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林彪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9月，他重游井冈山，返回北京后，还没回到毛家湾家中，就跑到钓鱼台来看江青。我记得，那次来，他就没有刮胡子，胡子白白的，比这次来照相还长得多、乱得多，足足有一寸长。头顶光光的。头顶下方周围的头发长长的、乱乱的。在他两旁坐着穿着干净得体的江青和叶群，显得十分不协调。我没有想到，林彪在会上的形象与会下的形象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会上的精气神儿，会下的狼狈相，判若两人，根本没有元帅的风度和领袖的气派，简直是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儿。

这次，林彪是专门来照相的，却也没有刮胡子，江青就不客气地动员他刮胡子。林彪说：“不用刮了。年纪大了，不要讲究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叶群为了打破僵局，忙劝林彪：“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胡子不刮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

林彪瞪了叶群一眼，没说什么。

江青又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该有领袖气派。”

在两个干净利落的女人不停地劝说下，林彪也就勉强同意了，说：“刮就刮吧。”

奇怪得很，林彪刮胡子也和常人不一样，既不用热水湿一湿，也不用热毛巾敷一敷，更不用香皂、肥皂或剃须膏抹一抹，而是干刮。

林彪临时决定在江青住地刮胡子，可想而知，不太方便，没有带刮胡刀。他的警卫员李文普问我：“杨秘书，你有刮胡刀吗？”我说：“有，就用我的吧。”我的刮胡刀是“飞鹰牌”双面刀架，注有“中国制造”四个字；刀片也是“飞鹰牌”的，上面写有“中国上海”四个字。刀架上设计有现代京剧《红灯记》李铁梅手举红灯的图案，转动刀架时，出现全身、半身两种图案。这副刮胡刀的刀架和刀片，现在我还完好地保存着。并不是做什么纪念，而是别人用过了，我不愿意再用，也没扔。

林彪的胡子是李文普帮他刮的。刮胡子时，林彪坐在一张带靠背的椅子上。由于是干刮，所以刮得刷刷作响，他既不说疼，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我心里想，林彪这个人确实让人难以

捉摸。

林彪刮完胡子，在江青、叶群陪同下，乘坐各自的汽车到17号楼。那里有谢富治专为江青布置的照相室。

进入照相室以后，江青拿着心爱的照相机，一边摆弄着照相用的灯具，一边对林彪吹捧说：“广大党员、广大群众和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都知道林副主席跟毛主席跟得最紧，对毛主席的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

这时，林彪端坐着，一言不发，静静地等待着江青摁动相机快门。江青调整好焦距和灯光，准备摁动快门时，却突然对林彪说：“林副主席，请你把帽子摘掉好吗？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相。因为我给你照相用的是顶逆侧光，你的帽檐遮挡了你的额头和眼睛的光线。”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平时出门总是戴着一顶帽子。江青叫他摘掉帽子，看样子他很不情愿。但是，在那种场合，他又不好说什么，于是不好意思地把帽子摘掉，递给了他的警卫员李文普。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摁动快门前，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真的是在看书，因为你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孜孜不倦的。”

叶群夸奖说：“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细致。”

江青立即叫我跑回10号楼，把我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来，交给林彪。我那本《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每册定价5.5元。这本书我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由此可以看出，江青为林彪拍摄捧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是临时起意。

平时怕光、怕风、怕热的林彪，为了照一张相只好听任江青摆布，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见他擦了头上、脸上和脖颈上的汗水，重新摆好姿势后，终于摁动了她那似乎难以摁动的快门。在一旁观看的叶群，鼓掌表示祝贺。

照完相，林彪和叶群准备离开钓鱼台时，江青说：“林副主席累了吧？明天如果你身体和精神都好的话，请林副主席再来一趟，咱们与这里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合一个影吧？”林彪点了点头，接受了邀请。

由于第二次照相的人数较多，需要梯子。我请示汪东兴后，他安排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负责办理。毛维中要了两辆军用大卡车，于当天下午从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把专为照相用的梯子运到了钓鱼台17号楼，摆放好。晚上，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之前，还亲自检查摆好的梯子，表示满意以后，才放心地看她每天离不开舍不掉的电影。

6月10日下午2时左右，林彪和叶群又来到钓鱼台17号楼与大家合影。江青叫我请来了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兼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大家拍照。杜修贤指挥大家站队时，林彪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说：“前面蹲一排嘛！”这张照片，由于人比较多，50人左右，冲洗、放大用时比较长，加之当时摄影部工作较忙，我们还没有拿到手，林彪、叶群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这张照片后来也就石沉大海了。

江青为林彪照完相以后，将胶卷立即送给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冲洗。两天以后，送来了照片小样。江青在小样上亲自作了精心剪裁，又送回新华社放大成16寸彩色照片。

江青拿到放大的照片后，让我打电话叫姚文元（当时负责宣传思想工作）和叶群到钓鱼台10号楼研究如何刊登的有关事宜。姚文元虽然对摄影艺术一窍不通，但为了讨好林彪和江青，还是吹捧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通过这张照片完全表现出来了，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我的意见，这张照片就叫《孜孜不倦》吧。刊登这张照片时，同时刊登主席的一幅照片。我叫《人民日报》发一条消息，我和他们一起措措辞。”江青说：“我看文元同志的意见好。叶群同志，你看呢？”叶群高兴地说：“好好好，我完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的意见。江青同志还有什么作品，以后还可以陆续发表嘛。”

林彪的照片发表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相太好了。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如此看来，形象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他特别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摄影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优秀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江青看了叶群打来的电话记录以后，叫我立即回电话给叶群。她说：“谢谢林副主席对我的鼓励。摄影艺术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好，同时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如果林副主席喜欢照相的话，我愿意给林副主席再照几张。”

林彪和叶群折戟沉沙以后，江青对给林彪照相，并对林彪进行宣传的事，就只字不提了。

□ 《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